

# 代際差異與小型社會中的媒體使用：澳門模式的理論探索及其對媒體生態研究的啟示

趙志龍 林玉鳳

**[摘要]** 本文考察小型社會中代際媒體使用差異如何隨時間演變。研究利用 2008–21 年間，覆蓋五類媒介（桌面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報紙、電視、廣播）和六個出生世代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分析探討不同代際群體在媒體使用上的變化趨勢及其深層次原因。通過使用適合監測世代趨勢的縱向分析模型，並以標準化均數差量化代際差距，我們的研究識別出三種趨勢特徵：桌面互聯網表現為“持續分化”（差距約 0.40–0.60）；移動互聯網呈現“快速趨同”（從 2013 年的 0.47 快速降至 2021 年的 0.06）；傳統媒體則呈現“波動平衡”。本研究在數字鴻溝領域提出“功能鴻溝”概念（超越接入與技能的功能／能力差異），並概括小型社會媒介生態的三種機制：高度互聯性、社會驅動性、文化敏感性；進而構建“澳門模式”，強調技術分化與社會趨同並存、危機驅動的媒體回歸，以及小型社會的網絡效應。研究成果可為新加坡、香港、愛爾蘭等小型社會的媒體變遷研究提供可比基準和理論參考，豐富媒體生態理論和代際理論在數字時代的應用。

**[關鍵詞]** 代際差異 數字鴻溝 媒體生態 澳門模式 小型社會

##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 （一）研究背景

隨着資訊與通訊技術的演進，過去 20 年全球媒體生態經歷深刻重組。互聯網（桌面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是互聯網的子集）改變了人們獲取資訊和進行社交的方式，並相對削弱了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和廣播的地位。<sup>①</sup>自 1952 年 Karl Mannheim 提出代際理論以來，<sup>②</sup>代際差異（generational differences）成為社會學研究的經典議題，在數字媒體時代獲得了新的理論內涵和實證意義。近期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代際差異在數字技術使用中的重要性，Fruzsina Stefán 等人在對維也納都會區人口的數字技能與休閒行為的研究中發現，不同世代群體在數字技能和行為模式上存在顯著差異，年長群體（嬰兒潮世代、傳統主義者）更多

**作者簡介：**趙志龍，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澳門大學傳播學博士；林玉鳳（通訊作者），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

<sup>①</sup> Chayko, Mary, editor. *Superconnected: The Internet, Digital Media, and Techno-Social Life*. SAGE Publications, 2020.

<sup>②</sup> Mannheim, Karl.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 Kecskemeti, Routledge, 1952, pp. 276–322.

依賴傳統規劃方式，而年輕世代（Z世代、千禧世代）則更傾向於使用數字化工具。<sup>①</sup>Irma Agárdi和Mónika Anetta Alt的比較研究也表明，“數字原住民”（Z世代）與“數字移民”（X世代）在移動支付等數字技術的接受和使用模式上存在根本差異。<sup>②</sup>Yasemin Bilişli等人在對土耳其2023年地震的研究中進一步驗證，不同世代在數字媒體消費習慣和虛假資訊識別方法上存在顯著差異，Z世代更傾向於使用數字工具進行資訊查證，而X世代則更依賴傳統廣播媒體。<sup>③</sup>這些研究為理解小型社會中代際媒體使用差異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澳門作為一個小型、密集且多元化的社會，居民的媒體使用行為反映了其面對快速媒體技術和環境變革時的反應方式。<sup>④</sup>與周邊地區相比，澳門的媒體生態呈現出其獨有的特徵：傳統中文報業歷史悠久且影響力較大，如《澳門日報》等主流媒體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時，作為歷史文化交流的樞紐，葡文和英文媒體也佔有一席之地，服務特定社群；此外，澳門特區政府對媒體的資助和影響，<sup>⑤</sup>以及博彩旅遊業作為經濟支柱對媒體內容的潛在塑造，共同構成了複雜的媒體環境。<sup>⑥</sup>這種相對集中且受多重因素影響的媒體結構，可能導致資訊傳播模式和居民的媒體選擇行為，與市場化程度更高或規模更大的地區存在顯著差異。特別是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不同代際群體在媒體使用上的分化情況尤為顯著，這為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證材料。

由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負責管理並由易研網絡研究實驗室執行的“澳門互聯網研究計劃”（Macao Internet Project）對本地居民的互聯網使用進行了年度調查並發表了眾多報告，<sup>⑦</sup>但這些研究多集中於互聯網整體的普及和使用趨勢，對互聯網內部的細分（如基於桌面電腦的互聯網使用與移動互聯網使用），傳統媒體與數字媒體之間的差異與轉型，以及不同類別的傳統媒體的代際使用率差異等問題缺乏深入分析。

本研究旨在填補這一研究空白，通過對2008年至2021年間澳門居民媒體使用行為的縱向分析，探討這些變化的深層次原因及其社會影響。

<sup>①</sup>Stefán, Fruzsina, et al. “Understanding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Digital Skills and Recreational Behaviour for Effective Visitor Management in Forest Destinations.” *Scientific Reports*, vol. 15, 2025,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5-02036-5>.

<sup>②</sup>Agárdi, Irma, and Monika Anetta Alt. “Do Digital Natives Use Mobile Payment Differently Than Digital Immigrants?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Generation X and Z.”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vol. 24, 2024, <https://doi.org/10.1007/s10660-022-09537-9>.

<sup>③</sup>Bilişli, Yasemin, et al. “Navigating Truth and Disinform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enerational Responses to the 6 February 2023 Earthquake in Digital Media in Türkiye.” *Heliyon*, vol. 10, no. 19, 2024, <https://doi.org/10.1016/j.heliyon.2024.e38667>.

<sup>④</sup>吳龍生、林發欽：〈社會公眾注意力視角下的澳門經濟多元發展思考〉，《港澳研究》（北京），第3期，2023年，頁45-55、94。

<sup>⑤</sup>Lam, Agnes Lok-Fong. “The Evolution of Media in Macao: From the Jesuit Press to the Digital Ag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Media*, edited by Ming-Yeh T. Rawnsley et al., 2nd ed., Routledge, 2025, pp. 311-28.

<sup>⑥</sup>李鑫宇、施瑞婷：〈澳門特區主流媒體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與創新策略——以《澳門日報》為例〉，《傳媒》（北京），第14期，2023年，頁41-43；Zhao, Zhilong. *Media Trust and Dependency in a Health Crisis: Evidence from Macau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University of Macau, PhD dissertation. ProQuest, search.proquest.com/docview/31768904.

<sup>⑦</sup>〈報告下載〉，澳門互聯網研究學會網站，[www.macaointernetproject.net/blog/category/report/](http://www.macaointernetproject.net/blog/category/report/)，2025年10月14日讀取。

##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從代際理論視角出發，探討澳門居民在 2008 年至 2021 年間媒體使用行為的代際差異及其演變規律。具體而言，本研究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在小型多元社會的特定情境下，不同世代群體的媒體使用模式如何體現“世代效應”，以及這種效應如何與數字技術發展相互作用。<sup>①</sup>

2008–21 年正值澳門經濟高速增長和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時期，不同世代群體以不同的生命階段經歷了這一變遷過程。例如，95 後（1995 年以後出生）是在數字時代成長起來的“數字原住民”，而 55 前（1955 年之前出生）則帶着前數字時代的經驗步入這個快速變化的時期。<sup>②</sup>這些基於澳門獨特發展軌跡所塑造的代際經驗差異，預計將深刻體現在不同世代居民對不同媒體的選擇和使用上。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以下關鍵問題：首先，不同代際群體在使用傳統媒體與數字媒體時，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和演變趨勢？其次，這些趨勢如何受到技術進步和社會變遷的影響？最後，澳門作為小型社會是否呈現出不同於大型社會的代際媒體使用規律？

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索，本研究旨在為代際理論在數字媒體時代的應用提供新的實證證據，並為澳門制定針對不同代際群體的媒體政策提供科學依據。<sup>③</sup>

##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模型

###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源於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在 2008–21 年間對澳門居民進行的周期性電話調查，這些調查細緻地監測了澳門各代人群媒體使用模式的變遷。通過年度調查評估，包括桌面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報紙、電視和廣播等各種媒體形式的使用情況。調查於每年 10 月至 11 月間進行，每年平均收集約 1,000 份有效問卷。通過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ATI）系統，隨機抽取澳門住宅電話號碼，並邀請生日最接近調查日期的一位年滿 15 歲或以上的居民參與電話問卷。這些年度媒體使用率調查在各年度中採用了相似的詢問方式，確保了問卷設計和調查流程的一致性。因此，如下表所示（表 1），這些數據在進行重新編碼後，可以以相同的數據結構進行縱向比較，有助於準確分析各代際群體在不同媒體形式上的使用變遷。

在 2008 年至 2021 年間，除了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因某些原因未進行調查之外，其他年度數據均已成功收集。對於這三年缺失的數據，研究採用了漸進平均法來補齊，具

<sup>①</sup> Mannheim, Karl.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 Kecskemeti, Routledge, 1952, pp. 276–322.

<sup>②</sup> Glenn, Norval. D. *Cohort Analysis*. 2nd ed., SAGE Publications, 2005.

<sup>③</sup> Lythreathis, Sophie, et al. “The Digital Divide: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75, 2022,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1.121359>.

體做法是根據缺失年份之前和之後的媒體使用數據計算出一個合適的平均值，從而保持數據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同時，為應對電話調查在抽樣上的潛在偏差（例如調查樣本可能會偏向年長群體），我們採用了澳門統計局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作為加權標準，對研究的分析數據進行加權處理。這一舉措旨在確保分析結果更能代表整體人口結構，從而提高研究結論的準確性和信度。<sup>①</sup>

表1 本研究中媒體使用率的測量方法

媒體類別	問題	選項
桌面互聯網	你有冇上網嘅習慣？（基於桌面互聯網）	1：有；2：冇；3：唔識答／拒絕回答
移動互聯網	你有冇上網嘅習慣？（基於手機或平板）	1：有；2：冇；3：唔識答／拒絕回答
報紙	你有冇睇報紙嘅習慣？ （一星期睇一日或以上為有）	1：有；2：冇；3：唔識答／拒絕回答
電視	你有冇睇電視嘅習慣？ （一星期睇一日或以上為有）	1：有；2：冇；3：唔識答／拒絕回答
廣播	你有冇聽電台嘅習慣？ （一星期睇一日或以上為有）	1：有；2：冇；3：唔識答／拒絕回答

註：以上問題在不同年份有所區別，但均可轉制為表1中的問項結構作縱向對比。

## （二）研究模型

### （1）澳門居民的不同媒體使用率縱向變化

在本研究中，我們旨在分析2008年至2021年間澳門居民在不同代際群體中的媒體使用率變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研究採用了基於年度數據比較的分析方法，並結合代際群體的劃分來深入探討這些變化的特徵和規律。<sup>②</sup>我們將澳門居民按出生年份劃分為六個不同的代際群體，分別為：“95後”（1995年及以後出生）、“85後”（1985–94年出生）、“75後”（1975–84年出生）、“65後”（1965–74年出生）、“55後”（1955–64年出生），以及“55前”（1955年以前出生）。每個代際群體在其成長和社會化的過程中，所經歷的社會、經濟和技術環境均存在顯著差異。例如，“95後”群體主要在數字技術和互聯網迅猛發展的時期成長，他們從小就接觸到數字媒體，因此在媒體使用習慣上可能顯示出與早期代際不同的特徵。“85後”和“75後”群體經歷了從傳統媒體向數字媒體過渡的關鍵階段，他們在青少年或成年早期適應了互聯網和移動技術的快速普及。而“65後”和“55後”群體則在一個以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廣播）為主導的媒體環境中成長。“55前”群體則大多在媒體技術發展相對緩慢的時期渡過了其成年早期。

使用代際群體的比較分析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捕捉各種媒體形式在不同代際群體中的普及或衰退情況。例如，通過觀察每年的使用比例數據，我們能夠識別出某些媒

<sup>①</sup> 〈人口統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網站，[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101](http://www.dsec.gov.mo/zh-MO/Statistic?id=101)，2024年8月28日讀取。

<sup>②</sup> Glenn, Norval. D. *Cohort Analysis*. 2nd ed., SAGE Publications, 2005.

體形式隨着技術進步和社會變遷而發生的重大轉變。同時，這一方法使我們能夠系統地分析不同代際群體在媒體使用行為上的差異，從而揭示這些差異如何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擴大或縮小。<sup>①</sup>這些趨勢為我們理解媒體使用行為的變遷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並為進一步探討技術變革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奠定了基礎。

## (2) 澳門居民代際群體間媒體使用率的橫向差異

研究模型的構建基於數字鴻溝理論，該理論源自於 1970 年代關於知識鴻溝的研究，並在隨後數十年間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sup>②</sup>數字鴻溝概念最初被提出用以描述在技術獲取和使用能力方面的個體差異，這種差異與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密切相關，並且這些不平等現象既是成因也是結果。<sup>③</sup>隨着互聯網的出現和快速發展，數字鴻溝被重新定義為一個複雜的多維現象，涵蓋了技術的獲取和使用差距，這兩者分別被稱為第一級數字鴻溝和第二級數字鴻溝。<sup>④</sup>

在研究中，為了更好地分析和理解不同代際群體之間的媒體使用差異，我們引入了計算代際媒體使用差異的模型。該模型以 Jan van Dijk 提出的技術獲取連續體模型為基礎，<sup>⑤</sup>將媒體使用差異定量化，從而提供一個統一且穩定的基準來解釋和比較不同群體之間的媒體使用行為。

公式 1 提供了計算代際媒體使用差異的方法：

$$G_{pi}=2 \frac{\sum_{i=1}^c d_{vi} = d_{v1} + d_{v2} + \dots + d_{vc}}{c} \quad (0 \leq d_{vi} \leq 1, 0 \leq G_{pi} \leq 1) \quad (1)$$

$d_v$  是距離指標，代表不同代際群體的使用率與平均使用率之間的差異。這個差異可以反映出該代際群體在某一媒體形式上的使用率與基準值的差異，該指標值理論範圍介於 0 到 1 之間。 $c$  代表參與比較的代際數，如共有“95 後”、“85 後”、“75 後”、“65 後”、“55 後”以及“55 前”六個代際參與比較，則  $c$  的值為 6。 $G_p$  是代際媒體使用差異值，理論範圍介於 0 和 1 之間 ( $0 \leq d_v \leq 1, 0 \leq G_p \leq 1$ )。這一範圍為解釋和比較媒體使用差異提供了一個統一且穩定的基準。

為了更好地理解該公式的應用，我們可以舉一個實際例子來說明。例如，假設我們有三個代際群體：“95 後”、“75 後”和“55 後”，他們在某一年中對某一媒體的使用率分別為 0.7 ( $d_{v1}$ )、0.6 ( $d_{v2}$ ) 和 0.2 ( $d_{v3}$ )，而使用率與平均皆為 0.5。則代際媒體使用差

<sup>①</sup> Parayil, Govindan.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ncreasing Returns: Contradictions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21, no. 1, 2005, pp. 41–51.

<sup>②</sup> Tichenor, P. J., et al.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4, no. 2, 1970, pp. 159–70; Lythreath, Sophie, et al. “The Digital Divide: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75, 2022,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1.121359>.

<sup>③</sup> Van Dijk, Jan A. G. M.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Poetics*, vol. 34, nos. 4–5, 2006, pp. 221–35; Vassilakopoulou, Polyxeni, and Eil Hustad. “Bridging Digital Divide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vol. 25, no. 4, 2003, pp. 955–69.

<sup>④</sup> Hargittai, Eszter, and Amanda Hinnant. “Digital Inequality: Differences in Young Adults’ Use of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5, no. 5, 2008, pp. 602–21.

<sup>⑤</sup> Van Dijk, Jan A. G. M., and Kenneth L. Hacker. “The Digital Divide a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henomenon.” *Information Society*, vol. 19, no. 4, 2003, pp. 315–26.

異  $G_{p3}$  的值為：

$$G_{p3} = 2 \frac{0.2 + 0.1 + 0.3}{3} = 0.4$$

通過這種量化方法，我們可以清晰地揭示代際群體在媒體使用中的差異，並進一步探討形成這些差異背後的原因。這不僅有助於理論研究，還可以為制定針對不同代際群體的媒體策略提供實證支持。

### 三、澳門代際群體數字媒體使用的理論分析

#### （一）桌面互聯網的代際分化

桌面互聯網的代際使用模式為驗證 Marc Prensky 的“數字原住民”理論提供了理想觀察窗口。<sup>①</sup>該理論假設 1980 年代後出生的世代因從小接觸數字技術，在認知結構和學習模式上與前數字時代世代存在根本差異。數據揭示了一個持續且穩定的代際分化格局：“95 後”和“85 後”群體自 2008 年起即保持接近 1.00 的使用率，體現典型的“數字原住民”特徵；“75 後”群體雖起步較低（0.84），但通過持續學習在 2018 年前後基本追平年輕世代，展現出“數字移民”的適應能力；相比之下，“65 後”、“55 後”和“55 前”三個群體則呈現明顯的“數字鴻溝”，使用率分別穩定在 0.86、0.60 和 0.19 左右，形成清晰的階梯式分布（表 2 和圖 1）。

這一分化模式在澳門具有特殊的理論意義。首先，澳門作為小型社會，理論上資訊技術傳播速度應更快，社會網絡的緊密性應有利於技術知識的擴散，但實際上，桌面互聯網的代際差異卻持續 14 年未見顯著縮小，這表明技術使用的代際差異並非單純的“資訊滯後”問題，而是深層的認知和需求結構差異。其次，澳門在 2002 年開放博彩專營權後，經濟結構更顯著地轉向以旅遊博彩為核心的服務業，對數字技能的需求急劇上升，理論上應推動所有年齡群體提升數字技能，但這種“社會驅動”並未有效縮小桌面互聯網的代際差異。相較於歐美大型社會中桌面互聯網使用率普遍下降的趨勢，澳門的總體使用率在 0.75–0.82 間保持相對穩定，這可能反映了小型經濟體中桌面互聯網作為“生產工具”的不可替代性。

<sup>①</sup> Prensky, Marc.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vol. 9, no. 5, pp. 1–6, 2001, <https://doi.org/10.1108/10748120110424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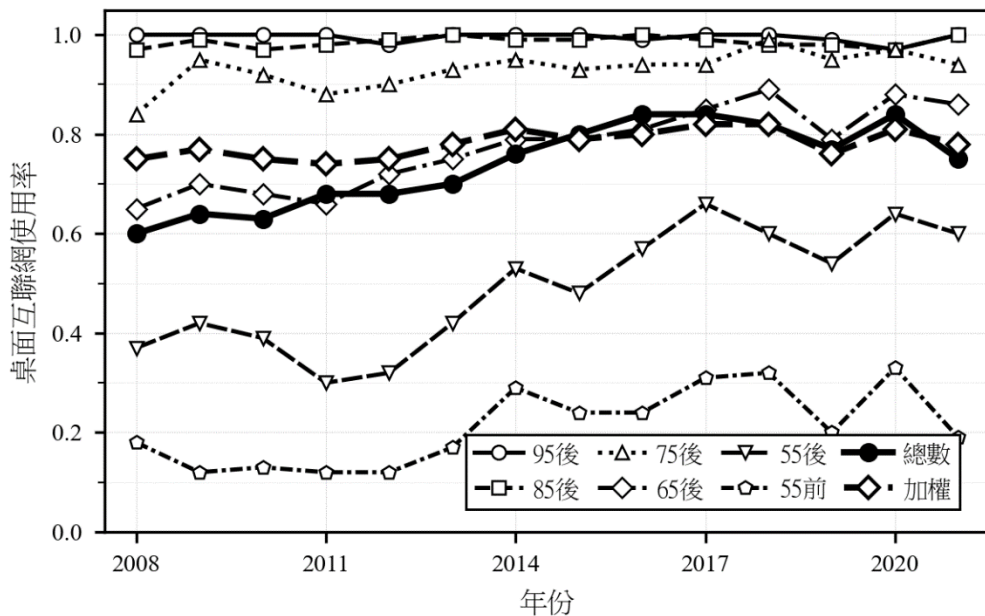
表 2 各代際組別的桌面互聯網使用率變化

代際組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95後	<u>1.00</u>	<u>1.00</u>	1.00	1.00	.98	1.00	1.00	1.00	.99	1.00	1.00	.99	.97	1.00
85後	.97	.99	.97	.98	.99	1.00	.99	.99	1.00	.99	.98	.98	.97	1.00
75後	.84	.95	.92	.88	.90	.93	.95	.93	.94	.94	.99	.95	.97	.94
65後	.65	.70	.68	.66	.72	.75	.79	.79	.81	.85	.89	.79	.88	.86
55後	.37	.42	.39	.30	.32	.42	.53	.48	.57	.66	.60	.54	.64	.60
55前	.18	.12	.13	.12	.12	.17	.29	.24	.24	.31	.32	.20	.33	.19
總數	.60	.64	.63	.66	.68	.66	.70	.76	.80	.84	.82	.77	.84	.75
加權	.75	.77	.75	.74	.75	.78	.81	.79	.80	.82	.82	.76	.81	.78

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組別在某一年的媒體使用比例。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的估計值。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圖 1 各代際組別的桌面互聯網使用率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 (二) 移動互聯網的快速趨同

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模式為理解數字技術擴散的驅動機制提供了重要案例。傳統的技術擴散理論強調“創新擴散”的 S 型曲線，認為技術採用主要受個體特徵影響，<sup>①</sup>早期採用者與後期採用者之間存在明顯的時間差和特徵差異。然而，澳門移動互聯網的使用數據呈現出一種“社會驅動型”的快速趨同模式，挑戰了傳統理論的解釋力。數據顯示，2012 年

<sup>①</sup> Rogers, Everett.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Free Press, 2003.

至 2015 年間是澳門移動互聯網發展的關鍵轉型時期。澳門的流動電信服務於 2012 年全面進入 3G 的時代，電信管理局更於 2015 年正式發放 4G 牌照，<sup>①</sup>智能手機日漸普及，加上此時進入澳門經濟增長的高峰期，<sup>②</sup>這些因素的疊加效應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技術窗口期”（表 3 和圖 2）。

數據顯示，所有代際群體在 2012 年至 2015 年間都經歷了移動互聯網使用率的“跳躍式”增長：“95 後”從 0.36 躍升至 0.78，“85 後”從 0.65 升至 0.85，甚至最年長的“55 前”群體也從 0.20 升至 0.57。這種“同步增長”模式在大型社會中相對罕見，體現了小型社會中技術擴散的獨特機制。澳門移動互聯網快速趨同的背後，體現了兩個重要的社會機制：首先是“示範效應”，在地理空間緊密的小型社會中，不同代際群體的日常接觸頻繁，年輕世代的技術使用行為更容易被年長世代觀察和模仿；其次是“網絡效應”，移動互聯網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網絡中其他用戶的數量，一旦某項移動應用成為社會生活的“必需品”，所有代際群體都會被迫快速採用。相較於香港的代際梯度和新加坡的政府主導模式，澳門體現了“市場驅動 + 社會需求”的“自下而上”特徵。

表 3 各代際組別的移動互聯網使用率變化

代際組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95 後	.15	<u>.14</u>	.13	.42	.36	.78	.87	.73	<u>.76</u>	<u>.79</u>	<u>.83</u>	.86	.86	.81
85 後	.21	.31	.32	.66	.65	.85	.85	.77	<u>.78</u>	<u>.78</u>	<u>.79</u>	.80	.86	.88
75 後	.21	.21	.34	.64	.62	.80	.86	.82	<u>.82</u>	<u>.81</u>	<u>.81</u>	.81	.89	.93
65 後	.12	.16	.09	.48	.52	.63	.78	.69	<u>.72</u>	<u>.75</u>	<u>.79</u>	.82	.85	.92
55 後	.06	.06	.04	.24	.33	.31	.68	.69	<u>.69</u>	<u>.70</u>	<u>.70</u>	.71	.86	.91
55 前	.04	.00	.01	.25	.20	.10	.57	.56	<u>.62</u>	<u>.68</u>	<u>.73</u>	.79	.79	.90
總數	.13	.15	.16	.55	.50	.53	.79	.74	<u>.63</u>	<u>.63</u>	<u>.62</u>	.80	.86	.89
加權	.15	.16	.17	.48	.48	.64	.79	.72	<u>.74</u>	<u>.76</u>	<u>.78</u>	.79	.87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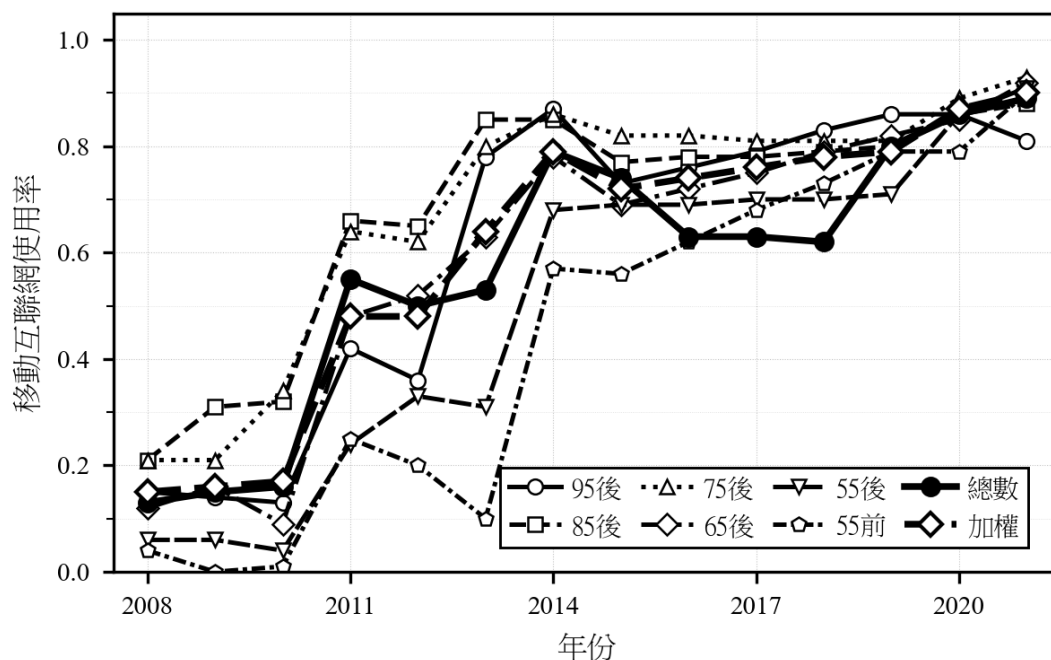
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組別在某一年的媒體使用比例。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的估計值。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sup>①</sup>〈3G 服務的進一步推動〉，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2012 年 1 月 13 日，[www.gov.mo/zh-hant/news/101052/](http://www.gov.mo/zh-hant/news/101052/)，2025 年 10 月 14 日讀取；〈經營採用長期演進技術（4G）的公共地面流動電信網絡及提供相關的公用地面流動電信服務牌照的公開招標之競投結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網站，2015 年 3 月 9 日，[www.gcs.gov.mo/news/detail/zh-hant/N15CI8fqmO](http://www.gcs.gov.mo/news/detail/zh-hant/N15CI8fqmO)，2025 年 10 月 14 日讀取。

<sup>②</sup>陳志誠、關鋒：〈回歸後的澳門經濟：經濟增長、勞動市場的發展和經濟多元化〉，《澳門研究》（澳門），第 4 期，2024 年，頁 65–80。

圖 2 各代際組別的移動互聯網使用率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 四、傳統媒體的代際使用模式

### （一）報紙閱讀的代際差異

報紙作為傳統媒體的代表，其使用模式深刻體現了 Pierre Bourdieu 文化資本理論的核心觀點：媒體消費不僅是資訊獲取行為，更是社會地位和文化品味的象徵。<sup>①</sup>在澳門這一多元文化交匯的小型社會中，報紙閱讀呈現出獨特的代際分化模式。數據揭示了報紙使用的一個重要特徵：“85 後”、“75 後”和“65 後”三個中間世代保持相對較高的使用率（0.70–0.85），而“95 後”和“55 前”兩個極端世代則呈現較低且快速下降的趨勢，形成“倒 U 型”分布模式（表 4 和圖 3）。

中間世代的高使用率可以從多個維度理解：首先，這些世代正處於職業發展的關鍵期，在澳門的經濟結構中承擔着重要角色，對深度資訊和專業分析有較強需求；其次，他們成長於澳門經濟轉型期，親歷了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產業升級過程，養成了通過報紙了解政策動向和經濟資訊的習慣。相比之下，“95 後”群體的低使用率反映了數字原住民的媒體偏好：他們習慣於快速、碎片化的資訊獲取方式，對報紙的線性閱讀模式缺乏耐心。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代際群體在 2019 年後都出現了報紙閱讀率的顯著回升，其中“95 後”群體從 0.53 躍升至 0.74，增幅最為明顯。這一現象可以從“媒介依賴理論”的角

<sup>①</sup>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Richardson John, Greenwood, 1986, pp. 241–58.

度理解：<sup>①</sup>在面臨重大不確定性時（疫情時期），公眾會重新尋求權威性和可信度較高的資訊來源。澳門報業的“集中與多元並存”格局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代際分化模式：《澳門日報》等主流報紙具有較強的權威性和影響力，而葡文報紙服務特定族群，體現了多元文化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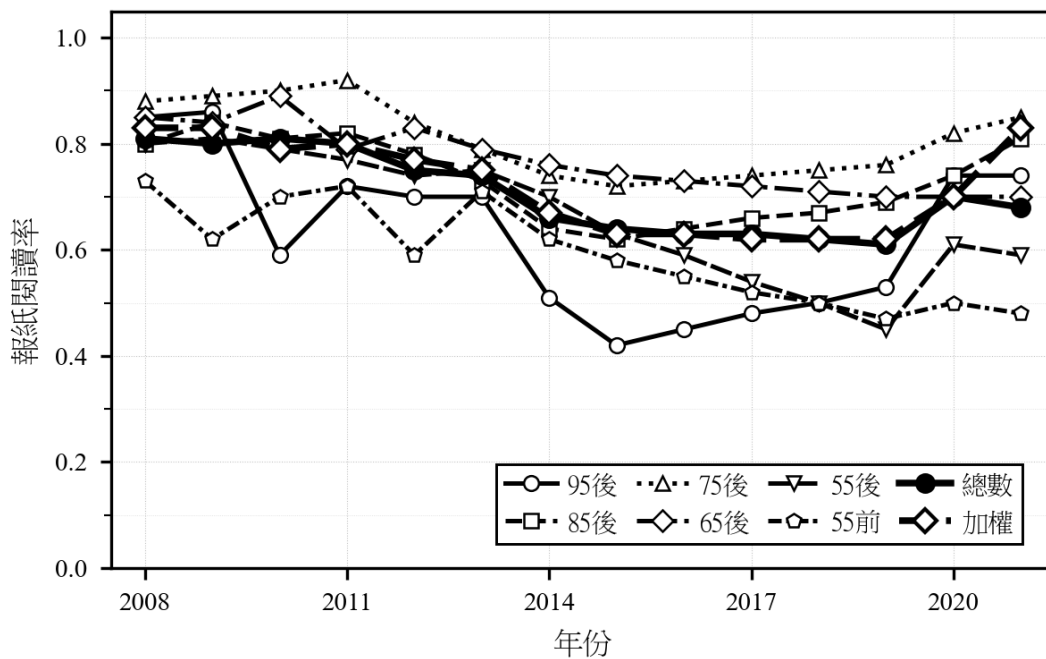
表 4 各代際組別的報紙閱讀率變化

代際組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95後	.85	.86	.59	.72	.70	.70	.51	.42	.45	.48	.50	.53	.74	.74
85後	.80	.84	.81	.82	.78	.73	.64	.62	.64	.66	.67	.69	.74	.81
75後	.88	.89	.90	.92	.84	.79	.74	.72	.73	.74	.75	.76	.82	.85
65後	.85	.84	.89	.79	.83	.79	.76	.74	.73	.72	.71	.70	.70	.70
55後	.80	.81	.79	.77	.74	.75	.70	.63	.59	.54	.50	.45	.61	.59
55前	.73	.62	.70	.72	.59	.71	.62	.58	.55	.52	.50	.47	.50	.48
總數	.81	.80	.81	.80	.75	.74	.66	.64	.63	.63	.62	.61	.70	.68
加權	.83	.83	.79	.80	.77	.75	.67	.63	.63	.62	.62	.62	.70	.83

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組別在某一年的媒體使用比例。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的估計值。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圖 3 各代際組別的報紙閱讀率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居民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sup>①</sup> Ball-Rokeach, S. J., and M. L. DeFleur.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Media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3, no.1, 1976, pp. 3–21; Zhao, Zhilong. *Media Trust and Dependency in a Health Crisis: Evidence from Macau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University of Macau, PhD dissertation. ProQuest, search.proquest.com/docview/31768904.

## （二）電視收視的穩定性

電視作為典型的“家庭媒體”，其使用模式深刻體現了家庭內部的代際關係和權力結構。<sup>①</sup>在澳門這樣以家庭為核心社會單位的華人社會中，電視收視行為往往是家庭成員間協商和妥協的結果，而非純粹的個體選擇。數據顯示，電視在所有媒體中呈現最強的使用韌性：各代際群體的使用率均維持在0.87–0.96的高位，14年間僅出現輕微下降（表5和圖4）。這種“高位穩定”模式在全球數字媒體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顯得尤為突出，體現了電視在澳門家庭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不可替代性。

從代際差異的角度看，電視呈現出“扁平化”的使用分布：不同世代間的差異相對較小，且這種差異在研究期間保持相對穩定，這與桌面互聯網的“階梯式”分化和移動互聯網的“趨同式”發展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扁平化分布反映了電視作為家庭媒體的獨特性質：它不像個人媒體那樣完全受個體偏好和技能水平影響，而是在家庭內部的權力結構和協商機制下形成相對均衡的使用模式。澳門電視收視的高穩定性與其獨特的居住模式和家庭結構密切相關：由於土地稀缺，澳門家庭的居住空間相對緊湊，多代同堂的現象較為普遍，這種居住模式客觀上增加了家庭成員的共處時間。

在這種環境下，電視觀看形成了“被動觀看”和“陪伴觀看”的複合模式：年長世代可能將電視視為主要的娛樂和資訊來源，他們的觀看行為相對主動和專注；而年輕世代雖然有更多的媒體選擇，但可能出於家庭生活的習慣，仍會參與共同觀看，他們的觀看更多帶有“陪伴”性質。這種“代際協商”機制使得電視在數字媒體衝擊下仍能保持較高的使用率。與報紙類似，電視在2019–21年間也出現了使用率回升，但幅度相對較小，這可能反映了電視在危機時刻的“資訊錨定”功能。

表5 各代際組別的電視收視率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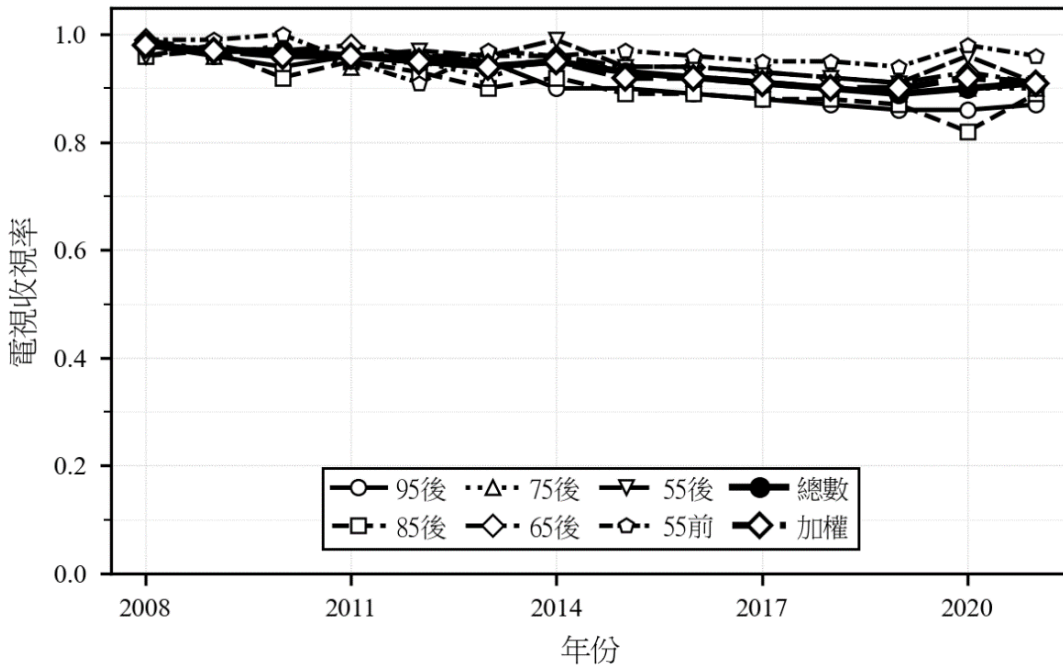
代際組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95後	.98	.96	.94	.96	.96	.95	.90	.90	.89	.88	.87	.86	.86	.87
85後	.96	.97	.92	.95	.93	.90	.92	.89	.89	.88	.88	.87	.82	.89
75後	.99	.96	.98	.94	.95	.92	.96	.93	.92	.91	.90	.89	.90	.90
65後	.99	.97	.97	.98	.96	.96	.96	.94	.94	.93	.92	.91	.93	.91
55後	.96	.98	.96	.96	.97	.96	.99	.94	.94	.93	.92	.91	.96	.91
55前	.99	.99	1.00	.95	.91	.97	.96	.97	.96	.95	.95	.94	.98	.96
總數	.98	.97	.97	.96	.95	.94	.95	.93	.92	.91	.90	.89	.90	.91
加權	.98	.97	.96	.96	.95	.94	.95	.92	.92	.91	.90	.90	.92	.91

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組別在某一年的媒體使用比例。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的估計值。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2008–21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sup>①</sup> Morley, David.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Comedia, 1986.

圖 4 各代際組別的電視收視率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 (三) 廣播收聽的特定功能

廣播在數字時代面臨嚴峻挑戰，但媒體生態理論認為，每種媒體都有其獨特功能定位。數據顯示，廣播呈現“倒 U 型”代際分布：“85 後”、“75 後”、“65 後”和“55 後”四個工作年齡世代保持穩定使用率（0.24–0.31），而“95 後”和“55 前”兩個極端世代維持較低水平（0.16–0.25）（表 6 和圖 5）。這種分布與澳門通勤文化密切相關。儘管地域狹小，但居住與工作地點分離，跨區通勤普遍，形成穩定通勤人群。廣播作為“伴隨媒體”，在駕車或乘坐公共交通時提供資訊娛樂，其聲音特性能與其他活動並行，在通勤場景中具有獨特優勢。廣播還承擔“資訊補充”功能，提供即時交通、天氣、股市等碎片化資訊，填補其他媒體空白。2019 年後廣播使用率回升，體現其在危機時刻（疫情時期）的“即時資訊”價值和“背景化”優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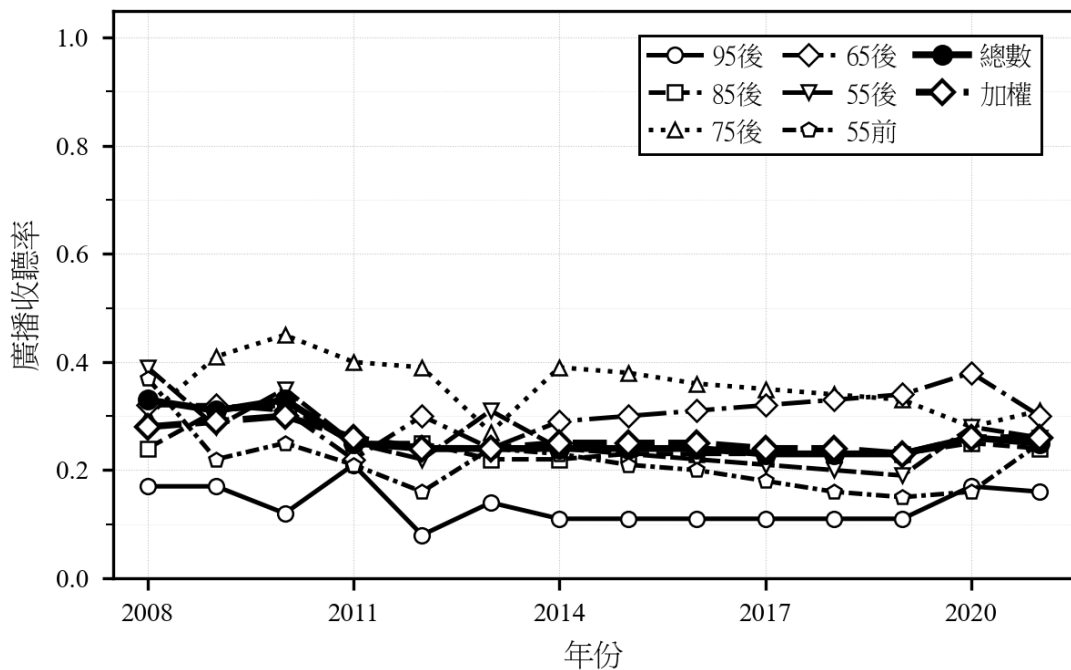
表 6 各代際組別的廣播收聽率變化

代際組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95 後	.17	.17	.12	.21	.08	.14	.11	<u>.11</u>	<u>.11</u>	<u>.11</u>	<u>.11</u>	.11	.17	.16
85 後	.24	.31	.32	.25	.25	.22	.22	<u>.23</u>	<u>.23</u>	<u>.23</u>	<u>.23</u>	.23	.25	.24
75 後	.30	.41	.45	.40	.39	.27	.39	<u>.38</u>	<u>.36</u>	<u>.35</u>	<u>.34</u>	.33	.28	.31
65 後	.32	.32	.31	.22	.30	.24	.29	<u>.30</u>	<u>.31</u>	<u>.32</u>	<u>.33</u>	.34	.38	.30
55 後	.39	.28	.35	.25	.22	.31	.24	<u>.23</u>	<u>.22</u>	<u>.21</u>	<u>.20</u>	.19	.28	.26
55 前	.37	.22	.25	.21	.16	.24	.23	<u>.21</u>	<u>.20</u>	<u>.18</u>	<u>.16</u>	.15	.16	.25
總數	.33	.31	.33	.25	.24	.24	.24	<u>.24</u>	<u>.24</u>	<u>.23</u>	<u>.23</u>	.23	.26	.25
加權	.28	.29	.30	.26	.24	.24	.25	<u>.25</u>	<u>.25</u>	<u>.24</u>	<u>.24</u>	.23	.26	.26

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組別在某一年的媒體使用比例。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的估計值。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圖 5 各代際組別的廣播收聽率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 五、代際差異的演變模式

### （一）三種演變模式的比較

基於前述分析，澳門代際媒體使用差異呈現出三種截然不同的演變模式，為媒體使用的代際差異理論提供了類型體系上的貢獻。這三種模式分別對應不同的社會機制和技術特徵，體現了小型社會中媒體生態的複雜性和動態性。桌面互聯網的代際差異值在研究期間保持在 0.40–0.60 的高位，呈現“持續分化”特徵，這種模式的形成源於多重機制的共同作用。首先是“技能門檻效應”：桌面互聯網需要相對複雜的操作技能和學習投入，包括鍵盤操作、軟件使用、檔案管理等多項技能，形成了較高的使用門檻。年輕世代憑藉“數字原住民”優勢較易跨越這一門檻，而年長世代則面臨較大困難，這種技能差異隨着時間推移並未顯著縮小。其次是“功能需求分化”：桌面互聯網主要服務於工作、學習等“生產性”活動，不同代際群體對這類活動的需求存在結構性差異，年輕世代處於教育和職業發展階段，對桌面互聯網的生產功能需求較強，而年長世代則相對較弱。最後是“替代技術競爭”：隨着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年長世代更傾向於選擇操作更簡便的移動設備，而非學習使用桌面電腦，形成了“技術路徑依賴”，這種依賴進一步固化了代際差異。

移動互聯網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演變軌跡，其代際差異值從 2013 年的峰值 0.47 快速下降至 2021 年的 0.06，呈現“快速趨同”特徵。這種模式的驅動機制體現了小型社會中技術擴散的獨特性。“社會必需性”是最重要的驅動因素：移動互聯網在澳門迅速成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特別是移動支付、健康碼等應用的普及，使得所有代際群體都被迫採用，這種強制性需求超越了個體偏好和技能差異。“技術友好性”進一步促進了趨同：相較於桌面互聯網，移動設備的觸屏操作更加直觀，降低了技術門檻，有利於年長世代的快速學習和適應。“網絡效應”在小型社會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旦某項移動應用達到用戶臨界數量，就會產生強大的網絡效應，推動全社會快速採用，這種效應在地理空間緊密的澳門表現得特別明顯。

報紙、電視、廣播三種傳統媒體雖然具體表現不同，但都呈現出“波動平衡”的總體特徵：代際差異在一定範圍內波動，但未出現持續擴大或縮小的趨勢。這種模式反映了傳統媒體在數字時代的“生態位調整”和適應策略。“功能重新定位”是這種平衡的基礎：傳統媒體從主要資訊來源轉變為“補充性”和“應急性”媒體，在特定情境下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這種功能轉換使其能夠在數字媒體競爭中找到生存空間。“代際協商機制”在家庭和社會層面發揮重要作用：不同代際群體通過協商和妥協，維持了傳統媒體的一定使用水平，這種協商機制在小型社會中可能更加有效。“文化認同功能”為傳統媒體提供了額外的價值支撐：傳統媒體承載着特定的文化價值和身分認同，這種功能在小型社會中可能更加突出，成為維持使用率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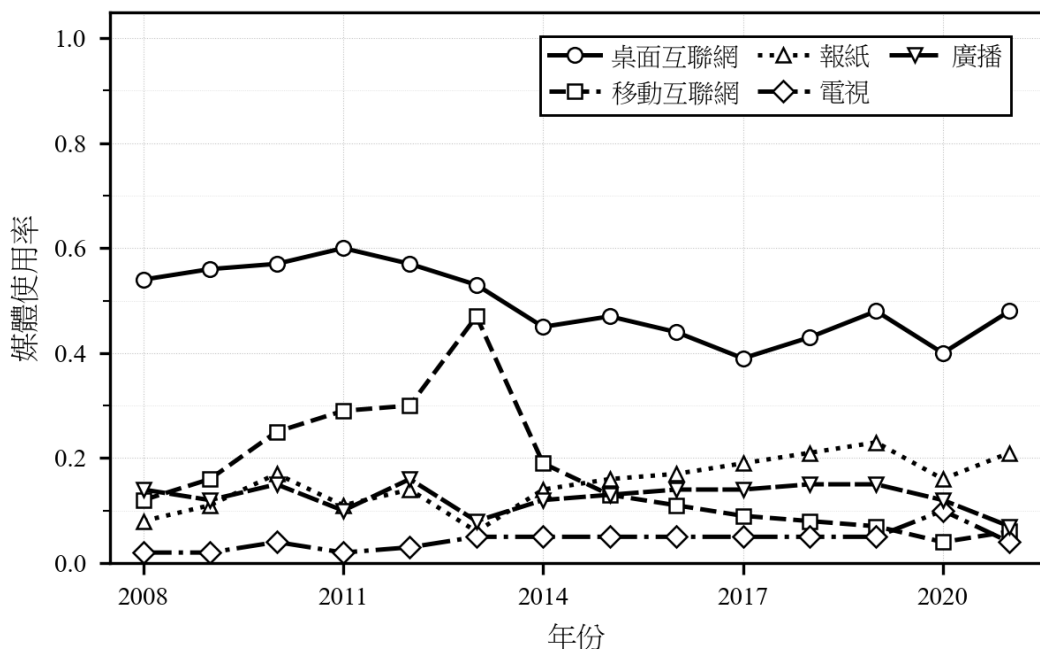
表 7 澳門居民代際媒體使用差異

媒體類別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桌面互聯網	.54	.56	.57	.60	.57	.53	.45	.47	.44	.39	.43	.48	.40	.48
移動互聯網	.12	.16	.25	.29	.30	.47	.19	.13	<u>.11</u>	<u>.09</u>	<u>.08</u>	.07	.04	.06
報紙	.08	.11	.17	.11	.14	.06	.14	.16	<u>.17</u>	<u>.19</u>	<u>.21</u>	.23	.16	.21
電視	.02	.02	.04	.02	.03	.05	.05	.05	<u>.05</u>	<u>.05</u>	<u>.05</u>	.05	.10	.04
廣播	.14	.12	.15	.10	.16	.08	.12	<u>.13</u>	<u>.14</u>	<u>.14</u>	<u>.15</u>	.15	.12	.07

註：單元格中的數字代表某一代際群體在該年份的代際媒體使用差異。斜體和帶下劃線的部分是根據過去和臨近年份計算出的估計值。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圖 6 澳門居民代際媒體使用差異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8–21 年的澳門人口年度追蹤調查數據計算整理所得。

## (二) 澳門模式的理論意義

澳門的經驗對傳統數字鴻溝理論提出了重要修正和補充。傳統理論主要關注“接入鴻溝”（access divide）和“使用鴻溝”（usage divide），前者強調技術設備和網絡連接的可及性差異，後者關注使用頻率和技能使用的差異，但澳門的案例揭示了第三種更為深層的類型：“功能鴻溝”（functional divide）。在澳門，不同代際群體對同一技術的功能需求可能存在根本差異：年輕世代將桌面互聯網視為生產工具，主要用於工作、學習和創作；年長世代則更多將移動互聯網視為生活工具，主要用於通訊、娛樂和日常服務。這種差異不是簡單的“有”與“無”的二元對立，而是“為甚麼用”和“怎麼用”的深層分化，體現了代際群體在技術認知和使用邏輯上的差異。這一發現需要後續訪談和田野調查的進一

步驗證，其對數字鴻溝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們需要超越簡單的接入和使用指標，深入理解不同群體的技术使用動機和功能需求。

澳門的媒體使用模式為媒體生態理論提供了“小型社會”的重要案例，豐富了我們對不同社會規模下媒體生態運作機制的理解。與大型社會相比，小型社會的媒體生態呈現出三個顯著特徵。首先是“高度互聯性”：不同媒體之間的相互影響更加直接和迅速，技術變遷的擴散速度更快，一種媒體的興衰往往會迅速影響到其他媒體的使用模式。其次是“社會驅動性”：媒體採用更多受社會需求而非個體偏好驅動，呈現出“集體行為”特徵，個體的媒體選擇更容易受到社會壓力和群體規範的影響。最後是“文化敏感性”：媒體選擇與文化認同、社會地位的關聯更加緊密，體現出更強的“象徵性”功能，媒體使用不僅是功能性行為，更是文化身分表達的重要方式。

澳門的案例為 Mannheim 的代際理論提供了數字時代的新詮釋，深化了我們對代際差異的理解。研究發現，代際差異不僅體現在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上，更體現在技術使用的邏輯和策略上。<sup>①</sup>“數字原住民”與“數字移民”的區分在澳門得到了清晰驗證，但同時也顯示出這種區分的複雜性：同一個體在面對不同技術時可能同時表現出“原住民”和“移民”的特徵，這種複雜性提示我們需要更加細緻地理解代際差異的多維性和情境性。

## 六、研究結論

基於 2008–21 年的縱向分析，本研究識別出澳門代際媒體使用的三個核心特徵，構成了“澳門模式”的理論內核。首先是“技術分化與社會趨同並存”的雙重特徵：桌面互聯網呈現持續的代際分化，14 年間差異值始終維持在 0.40–0.60 的高位，體現了技術複雜性和功能需求對代際差異的固化作用；而移動互聯網則實現快速趨同，差異值從 2013 年的峰值 0.47 快速下降至 2021 年的 0.06，這種並存現象揭示了不同技術特徵與用戶需求的複雜互動，挑戰了技術決定論和社會決定論的單一解釋框架。其次是“危機驅動的媒體依賴”現象：2019–21 年間所有傳統媒體類型都出現使用率回升，其中報紙的回升最為明顯，“95 後”群體的使用率從 0.53 躍升至 0.74，這一現象揭示了傳統媒體在不確定性環境中的“應急功能”，以及公眾在危機時刻對權威資訊來源的重新依賴。最後是“小型社會的網絡效應”：在地理空間緊密、社會網絡高度重疊的環境中，媒體使用呈現出強烈的“集體行為”特徵，個體選擇受社會壓力和示範效應顯著影響，這種效應在移動互聯網的快速普及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對既有理論框架的補充和發展。對數字鴻溝理論而言，本研究提出“功能鴻溝”概念，強調代際差異不僅在於技術接入和使用頻率，更在於使用

<sup>①</sup> Mannheim, Karl.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 Routledge, 1952, pp. 276–322.

目的和方式的深層分化，這一概念豐富了數字鴻溝理論的內涵，為理解數字時代的社會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視角。對媒體生態理論而言，本研究揭示了小型社會媒體生態的獨特機制，包括高度互聯性、社會驅動性和文化敏感性，這些特徵與大型社會形成鮮明對比，為媒體生態理論提供了重要的類型體系上的補充。對代際理論而言，本研究在數字時代背景下重新詮釋了 Mannheim 的代際理論，強調技術使用邏輯的代際差異，並揭示了“數字原住民”與“數字移民”區分的情境及其複雜性。

澳門作為小型多元社會的代表，其媒體使用模式對理解全球化時代的媒體變遷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特別是對於其他小型社會（如新加坡、香港、愛爾蘭、盧森堡等），澳門的經驗提供了有價值的比較基準，這些社會在地理規模、人口結構、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澳門的媒體使用模式可以為理解這些社會的媒體變遷提供理論參考。同時，澳門的案例也為大型社會中的“小型社區”（如城市社區、族群社區、職業社區等）的媒體使用研究提供了理論啟示，這些社區雖然嵌入在大型社會中，但在內部往往表現出類似小型社會的特徵，澳門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社區的媒體使用模式和變遷機制。